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共产党人的 ZHONGGUOGONGCHANDANGREN DE 文化自觉 WENHUA ZIJUE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刘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人的 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

刘 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
刘辉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1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8-0060-7

I. 中… II. 刘… III.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
1919—1949 IV.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709 号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书 名: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

作 者:刘 辉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80mm×230mm 1/16

字 数:349 千字

印 张:23. 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060-7

定 价:41.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导 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如何深化	1
第一章 中共创生的文化背景和早期共产党人的 文化观	13
一、文化的双重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3
二、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关怀	18
三、文化论争的重要成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 解析	27
第二章 大众化：“左翼”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及其 发展	37
一、从文艺“大众化”到文化“大众化”	38
二、中共的“大众化”观：文化“大众化”追求之内涵	46
三、周文对文化大众化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53
第三章 民主化：中共追寻的文化精神与政治理想	63
一、早期中共党人对民主的追求和思考	63
二、民主的国家形态之认知及其实践历程	80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主旗帜的高扬及其实践的 自我解读	89

2	第四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的科学观	107
	一、提倡科学与破除迷信:中共的一个重要传统 ...	107
	二、唯物史观与科学:中共党人对“社会科学”的认知 ...	112
	三、自然科学的追求:抗战前后边区的有关认识与实践	123
	第五章 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思想意义	133
	一、早期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疏忽及其原因	133
	二、“新启蒙运动”前后中共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初步觉悟	137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与阐发	142
	四、毛泽东的独特贡献与文艺“民族形式”和学术“中国化”之探讨	149
	五、“民族性”认知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	159
	第六章 “文化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之关系	165
	一、从“文化人”一词的流行说起	165
	二、“延安文化热”与中共高层“文化意识”的强化 ...	169
	三、中共的“文化人”观及知识分子政策	176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与主体内涵	189
	一、“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形成标志新论	189

二、文化纲领的再认识	195
三、毛泽东和张闻天两篇奠基之作的比较	201

第八章 1940 年至 1956 年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

传播与深化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传与高校课程之开设 ...	211
二、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经济思想的深化及 其他	223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发展之概观	236

第九章 新民主主义道德思想的探索及其实践 ...

一、抗战以前中共党人对道德问题的思想探讨 ...	252
二、从“共产主义者道德”到“新民主主义道德” ...	257
三、体系建构的尝试:《新民主主义的道德》与 《论国民公德》	265

第十章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探索与体系

建构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279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主体内容	284
三、新民主主义教育学的体系构建和学制改革 ...	297

第十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文化

过渡的历史考察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在全国的确立	310
二、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过渡	315
三、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广为传播及其影响	318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之反思 ...	325

4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31
	附录 1	337
	附录 2	347
	附录 3	361
	后 记	371

导 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如何深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化论争予以深入总结之后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建国以后,中共就是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发展方针,并取得重要的成就。

十六大以来,中共明确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十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十七大报告也继续重申了这一点。但所谓“和谐文化”,即与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文化,在本质上仍然必定是“民主的”、“科学的”,为“人民大众”服务性质的。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些根本性的追求,真正积极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那富有活力的“文化创新”,都只能落空。而“中国特色”的文化自觉,又决定了其必须保持“民族性”的特质。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①的文化任务,便集中地体现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页。

了这一点。

凡此种均表明,在新的形势下,建设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其实仍然离不开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时代实际上又已在更高的起点上,提出了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新的要求。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前人已经做过各种形式的研究。今欲继续展开探讨,除现实理由外,其突破路径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笔者沉浸此一课题的研究十余年,每次研讨其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作此思考。今全书告竣,理当从整体的角度,再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取径做一较为全面的交代,以为读者诸君导读,兼与同行学者商讨。

笔者以为,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思想和实践并重。而思想的研究,又往往需要首先在其源头处着力发掘。探讨中共的文化建设史,其理亦然。笔者长期执着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这正是动力所在。

虽然,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海内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宣传和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即便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曾掀起高潮,较多涉及这一问题)^①,但在笔者看来,以往的有关研究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盲点,尚有许多可以深化的地方。大体而言,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往往满足于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几条“新民主主义文化纲

① 以总体研究方面的成果为例,曾宪林、张艳国的《试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朱成甲的《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曾彦修的《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陈晋的《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等,可为代表性研究论文。此外,关于中共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些专著也涉及这一课题,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寇清杰的《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文化观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朱志敏的《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等。此外,美国学者大卫·阿帕特和托尼·赛奇使用“话语分析”法对延安时期中共理论及其影响进行的分析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参见David E. Apter &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领”的一般说明,而较为忽略对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彼此的历史关系,以及各分支领域丰富具体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揭示。

二是往往局限于对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论述,而较为忽略党内外众多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的理论贡献,如周文在“文化大众化”思想方面的成绩,潘朗对新民主主义道德论的较系统论述,朱智贤等对新民主主义教育学说的创造性阐发等。同时,对当时一些地位相对较低的中共领导人的相关思想,重视也相对不足,如谢觉哉的乡村民主建设思想,瞿秋白、恽代英等的社会科学观,陈伯达、艾思奇等的文化民族性思想及其影响等等。自然也就缺乏对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分支领域之具体思想作用的定位分析。

三是相对比较注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问题的研究,而对于1940年以后该理论的继续发展则基本忽略。而在“形成”问题研究中,对该理论的内在整合机制、形成契机和“标志”问题的综合性探索,也仍有待明确和深化。

四是不大注意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与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之间差异性思想的研究,因而也不太注重深入探讨,特别是整体把握建国后头几年“文化过渡”的思想历史,它的特点、得失及其与整个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欲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首先应当加强对其自身体系的结构关系及其形成的历史逻辑的认识与分析,同时还要注意对其核心观念进行历史视角的系统把握和深入透视。

今天,人们一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科学观、民主观、民族观、大众观,以及学术发展理念等问题,学界却长期较为缺乏从整体角度进行的认真细致的“发掘”、系统贯穿的整理和扎实深入的分析论证。这方面的专文很少能见到,更不用说专著了。与此相关,对科学观、民主观、大众观、民族观和道德观等问题中本应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也有令人遗憾的忽略乃至缺漏。比如早期共产党人民主观的整体特征,及其他与抗战时期中共边区民主实践的自我诠释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再比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的问题,等等。

以后者为例,中共的“社会科学观”本是连接唯物史观和中共党人对于社会现象和理论的研究、形成其社会革命思想的中间环节,它不仅深刻地体现着

中共对“科学性”的把握和对科学精神的认知,也是其得以实现唯物史观之科学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它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就无助于理解何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要那么热衷于编写各种“社会科学概论”,何以能在社会科学的宣传方面自信十足、独占鳌头,并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下于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历史现象了。而上述这一切研究的不足,自然也不能不影响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总体深度。

本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基本精神的各个部分之分支体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关联,乃是该深入探讨的先期问题。不弄清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地位,就很难准确揭示这一思想的历史特征。比如,关于新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特质,中共党人早在五四后期就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认同;对于“大众化”问题,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民族化”问题却一直是其相当忽视的薄弱点。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的文化民族性意识才空前觉醒。这一清醒意识的明确和强化,不仅明显地影响了其“科学观”、“民主观”和“大众观”的内容,更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其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新的整合。因此,这一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处于相当关键的地位,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思想环节。^① 以往党史学界对这一点的忽略,或多或少也表现出将其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时的历史感之不足。无疑地,类似的问题如果加强研究,我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认知,就会进一步增强立体感和深度。

其次,应当着力推进对学界较为忽略的 1940 年至 1956 年间中共文化思想的探索,可以说,这是目前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实际上,1940 年初毛泽东和张闻天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之后,这一文化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像许多研究者所揭示或表明的那样,似乎已经终结。中共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各种普通文化宣传工作者,在其大量的论著和报刊文章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许多具体方面,都有过进一步阐发的宝贵内容,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形态和社会风尚的建设(远不只是共产

^① 可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思想意义》。

党员的修养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追求(并不限于“讲话”精神),新民主主义的科学观,以及对新民主主义教育体制的新认识,等等。这其中,有许多富有价值的论著因种种原因被长期埋没,隐而不彰。

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形态问题,1940年以后就曾经有人进行过专门探讨,并出版过专著。如1949年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潘朗所著《新民主主义的道德》一书,就是典型。在书中,潘朗不仅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力量源泉(包括中共政策及其长期革命的“道义性”),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身的“道德性”以及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还说明了这一道德体系自身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等问题。就笔者所知,它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名义下,比较完整地直接探讨该问题的唯一专著。但长期以来,该书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同样被人们忽略和遗忘的,还有1941年3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哲学论》一书,作者署名宋无。该书首次专门从哲学的高度,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及其哲学根据进行了整体把握,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乃是这新文化的综合底集中底表现”。同时,它还首次阐发了对于“新民主主义哲学”基本特征、内涵,其强大的文化功能以及当时“新民主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问题的初步认识。该书对新民主主义哲学几种基本特质及其彼此间关系的辩证解说,对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实不无助益。如在强调这一新哲学的“民主性”时,它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哲学必须是给“新民主政治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必须是在批判继承中国旧文化传统中“民主性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史”的哲学;必须是“丰富了世界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同时给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压迫人们锻炼了模范的民主政治理论底基础”之哲学;还必须是“为中国民主政治将来作进一步发展而尽其理论上的开导工作,这就是说,它将为之做启蒙工作,并指示着中国民主政治将来应循的发展之路”的哲学,等等。其论述本身虽谈不上简洁精辟,但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表示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民主”关注,却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品格。

再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问题。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的体系化探索无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前后,一些进步教育工作者还曾掀起过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热潮,出版过不少有价

值的专著。其中,朱智贤 1949 年出版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常春元 1950 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等,就堪称此类探索的典型代表。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鉴于当时社会上还缺乏对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系统认识”的现状,从教育原理出发,对这一新式教育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管理”、课程学制的特点,乃至教育行政等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各自的理论探讨和阐发,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却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思想的活跃度和创造性,表明了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思想体系的文化冲动。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一般著作,就是众多的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论著,也极少提及它们。它们被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

毋庸讳言,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少有价值的专题论著和众多带创造性的宣传作品被漠视、忽略的现象,是由于以往学界较多地注意去揭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在各文化领域里的具体实践表现,乐于展现其光辉业绩和进行空洞的理论概括,而相对忽略了从真正的思想史的角度,去对各文化分支领域自身体系建设的理论成果进行开掘和研究的结果。目前,这一局面显然已经到了应该努力加以改变的时候。

与此同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建国初期即 1949—1956 年这一重大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性,目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有待加强。这一时期,中共一方面在《共同纲领》中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准备着向社会主义文化的逐渐过渡。特别是 1953 年后,这种文化过渡明显加快,其间也开始出现对日后影响深远的用群众运动方式,通过批判手段解决复杂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做法。过去,对于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出现的这些偏颇倾向,论者一般仅将其放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中去看待,而没有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认识,没有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合理转化关系中去把握。这就不利于更好地从中共文化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中,去总结其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实际上,通过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探讨,既阐释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理论上的逻辑联系,更注重揭示它们之间的实质区别(以往谈联系的较多),这对总结有关的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欲深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我们还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文化思想体系内部,至少还应该着眼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自觉地将其放置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这一总体脉络中去进行认知。

若是从这个角度着眼,有一些有价值的专门探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著作,便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如1949年李勉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本质论》一书,就是这样一部重要但却长期被遗忘了的宏观理论著作。在该书中,李勉明确强调,直到建国前夕,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讨,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有关的“知识”还“非常幼稚”,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清醒而自觉地将包括经济、文化等问题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视作一个有待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在该书中,他鼓足勇气,多方面地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的本质论”问题,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解决,往后的研究便会缺乏一般的理论根据”。他强调新民主主义具有其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态,“一方面是独特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又是带有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同时还论述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的矛盾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在这一社会的“发展前期”,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等等。应该说,这类整体的新民主主义本质论观点,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认识的深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本质”在根本上制约着其文化思想的形态和特征。

建国前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探讨也达到了顶点,著名经济学家如马寅初、沈志远、许涤新、孟宪章等都分别撰写论著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及其在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理论内容,对我们认知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质,也不无裨益。这不仅因为“经济思想”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且还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文化思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际地位。

以1950年沈志远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这部全面论述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专著为例。该书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规律性以及构成、经济政策等问题就展开了全面探讨,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如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无危机、直线式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劳动大众的福利是同时并

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非一帆风顺，而必须通过坚强持久的自觉斗争才能达到。“斗争中求发展，并且是在自觉的斗争中求发展，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规律中最基本性的决定一切的契机”等。同时，沈志远还由此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些就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斗争性等问题，是研究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能不参考的。

第四，欲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还不能总是就思想谈思想，适度地将其文化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也是很必要的。

由于中共的文化思想不是书斋里繁琐精细的理论构造，而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就内在提出了从实践来配合解读其有关文化思想的学术要求。无论是教育、道德，还是文学、科学、民主与知识分子观等，都是如此。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理论探讨和学科实践一开始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国前后尤其显著。适当揭示其学科实践的特点，对于认知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益处，显而易见。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就更是如此。至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的“过渡”，由于整体性的思想表述之缺乏，其文化实践的分析，也就不能不成为相关思想探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适度的实践考察，不仅可以验证其思想的真实性，也有助于反映和揭示其理论的力度和有效性。这也是“思想文化史”难以简单割裂的原因。

正是在进行这种思想和实践适度结合的研究时，笔者特别注意到了除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外，还有两次重要的中共文化会议，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次是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另一次是1944年10至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特别是前一次会议，它是最终促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得以在当时奠基的标志性会议。会议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文教资料总结准备工作，并事先将这些材料提交给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高层领导参阅。三位领导人随后在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文化统一战线》等重要论著，都是在它的直接推动下完成。笔者在本书中之所以将这三篇论著和此次代表大会会后发表的《宣言》，共同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标志，也主要是据此

而提出(同时也考虑了其他相关因素,并诉诸“集体智慧结晶”的方法论原则,详细论证见本书第六章)。而1944年底召开的那次边区文教大会,其重要性则在于,它在全面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奠基之后,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文化发展情形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向人民大众学习”的新文化整体发展方向,并响亮地提出“人民的文化”和“人民文化的时代”等口号,激发并汇成其后全国范围内“人民本位文化”的高昂主旋律,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初。

以往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对上述这两次重要会议多较为忽略,对其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也缺乏必要的揭示和估定,我以为这当是需要补充和加以改进的。

此外,在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重视研究这一文化思想的探索与同时代各种其他文化思潮之间的历史关联,注意比较其异同,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时代特质。近些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如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思潮中去研究,探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新民主主义的影响等等,^①但这方面的探讨还远远不够,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于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具体途径,或许还可以列举一些。但笔者以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应该明确树立如下的研究意识,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并非只是那几条人们耳熟能详的基本纲领的简单推衍,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具体和深刻的内容;无论如何,广大的普通文化理论宣传工作者不应被排除在这一思想理论的创造者之外,它不仅表现在该理论基本形成的过程当中,也体现在其形成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成就,应归功于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内普通理论工作者之间真正的互动而形成的“集体共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仅表现在已经阐发的各种言论著作中,同时也还凝聚和体现在其文化实践中,等等。这样的方法意识,当然并非我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笔者在长期搜集和阅读各种资料时所得出

① 可见张勇:《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陈金龙:《孙中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8期;宋进:《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董世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

如果诉诸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便不能不对研究者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它起码要求其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地注重去发掘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广大党内外普通文化工作者被忽略的“声音”,注意去发掘此期出版的众多地方报刊、论著和档案资料,尤其是那些过去被人忽略的当年油印和出版的宣传材料、讨论提纲和各类学习手册等。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条件,多采访当年参与文化宣传工作的健在人士,搜集有价值的口述资料。只有将研究建立在这样一种扎实的资料工作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望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所蕴藏的丰富多彩的思想历史,那些各种文化工作者在传播和阐发这一思想过程中创造的、长期被忽略了的有关“细化”、“深化”和“变化”、“转化”的内容,真正富有成效地“重建”起来。在这一研究中,中国共产党那种“集体智慧”的思想方法论,显然应该得到更大力度的运用。这既是历史认知本身所内蕴的学术任务,也是新时代文化理论建设所提出的现实要求。^①

本书的系列研究,就是在上述设想的支配和推动下完成的。当然,对其中有些想法(如进行口述调查和访谈)只是做了部分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计划完全实现,只好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努力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一直重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讨,尤其注重对1940年以前该思想的形成和内涵问题进行再探索,先后发表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标志新探》等多篇专题学术论文,得到不少同行的鼓励。同时,我还密切关注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态,发表过《近2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研究述评》和《近20年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述评》等综述性论文(见本书附录)。2003年,在此基础上,我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1940—1956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与深化研究”,并获批准立项。这就使我的相关研究,得以前后贯通起来。

此后,在对该课题的研究中,我又进一步接触和搜集了丰富的相关资料,特别是搜集到不少延安时期出版的各种宣传品(版本不同的小册子和论著),以及当时延安和东北、华北各解放区的一些政府机关和文化机构研讨“新民主

^① 这里论述的有关内容,部分曾以《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之我见》为题发表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上,可以参考。